



臺灣社會變遷下之單親家庭困境

郭靜晃 吳幸玲

壹、前言

家庭一直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也是個體最早社會化的場所，舉凡個人的生存、種族的繁衍、國家的建立、文化的傳承以及社會秩序的維持，莫不以家庭為依歸，儘管社會如何的變遷，家庭在過去一直是提供共同居住、保護、情感支持、經濟合作、教育功能、性與生殖的最主要社會團體。晚進，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與分化之下，家庭結構逐漸產生質的轉變，尤其在二次戰後，更產生空前的巨變。紐約「人口協會」(Population Council)在一九九五年所發布的研究報告便指出：家庭不再是穩定且具有凝聚力的單位。日愈減少的傳統家庭，家戶人口數因為生育率降低而減少，更多人經歷不穩定的家庭生活與異質家庭，以及家庭內部的分工與經濟角色有了顯著的改變等 (Wetzel, 1990:4-5)。然而，日漸增加的未婚

媽媽，逐漸攀升的離婚率，小家庭的盛行及女性日益貧窮的現象，才是當今世界的重要趨勢；全世界不管富裕或貧窮的國家，家庭結構都在進行影響深遠的改變：這些現象不只發生在美國，而是一種全球性的普遍現象(鄭清榮、譚悠文，一九九七)。在上述社會變遷中，不論是歐美或臺灣，單親家庭是成長最快速的家庭類型。美國曾預估在一九九〇年代出生的小孩在成年之前，將有一半的機會會處於單親家庭中 (Bumpass, 1984) 而且有較高機會處於經濟匱乏 (McLanahan & Sandefur, 1994)，而英國及澳洲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九〇年間，單親家庭也增加五〇%左右，法國及瑞士等國的單親家庭也增加二〇% (Kameran & Kahn, 1989)，因此，就整個「經濟合作發展與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國家來看，單親家庭的增加幅度也在三〇%—五〇%(張清富，一九九五；彭淑華、張英陣，一九九六)。相對於臺灣單親家庭的發展，由一九九〇及二〇〇〇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來估算，約增加了二一%(參見表一)，其增加的速度實不下於上列開發中國家。

由於單親人口的統計會因其操作定義與調查策略之差異而有不同的推估，因此目前臺灣產官學界對於「單親」並沒有一致的定義與估算標準，不同研究單位有著不同的結果。整體上來說，臺灣單親家庭顯現的比例仍較歐美為低，但是近年來有逐漸加溫的趨勢，且值得擔憂的是它的成長型態正逐漸步入西方社會的後塵：有越來越多的單親家庭源自於離婚與未婚生子，且居住型態也呈現多樣化面貌。以薛承泰教授的研究為例，其曾就一九九〇年人口普查資料推估我國單親家庭約佔全部普通住戶（包括單人戶）的三・九%，數量將近二十萬戶，男、女單親中離婚為單親種類的大多數，男女單親比為四：六（薛承泰，一九九六a）；若只考慮有十八歲以下兒童家戶，那麼臺灣地區單親戶約佔六・五%；也就是說，在有未成年兒少的家庭中，每十六戶約有一戶是單親戶。在考量臺灣社會網絡特性與不同居住型態的影響下，他又採用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一九九一—一九九九年原始資料進行分析，將原有的單親定義加入分居樣本後成為狹義單親，然後再擴大兩個層次的定義，分別加入配偶為戶外人口、同居、祖孫與次單親等家庭（表一）（薛承泰，二〇〇一）。之後，薛承泰以廣義單親戶之定義，分析臺灣地區兩千年普查發現，臺灣地區有二七七、五八七單親戶，佔總住戶之四・三%，佔總家戶之五・五%，佔有兒少家戶之九・四%；其中有八〇、九八六為祖孫戶，將近佔單親戶的三分之一，這也是十年來增加最多的單親戶種類。兩千年單親兒少有四四三、五四〇人，佔總兒少人數約百分之八，相較於一九九〇年普查呈現單親兒少三

表一 臺灣地區單親家庭及其子女推估比例

1990	單親家庭比例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2000
3.9	定義一	5.1	5.6	5.9	5.4	5.7	5.8	6.2	6.6	4.7
	定義二	6.1	6.6	6.9	6.5	6.6	6.6	7.3	7.6	
	定義三	6.5	7.0	7.4	7.0	7.0	7.3	8.0	8.1	
單親定義 包括未婚、離婚及 喪偶	定義一：包括未婚、離婚、分居及喪偶單親 定義二：定義一加上配偶為戶外人口及同居單親 定義三：定義二再加上祖孫隔代單親及三代同堂次單親									單親定義 包括未婚、離婚、 喪偶
** 母數同為戶中有 18 歲以下兒童之家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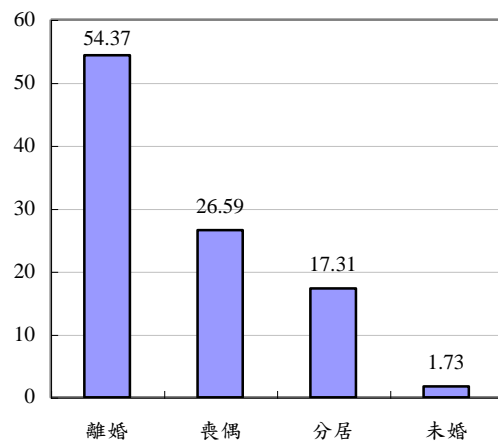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薛承泰（1996a）；薛承泰（2001）；內政部戶政司（2001）

二五、五七六人，佔總兒少數約百分之五。此分析報告不僅顯示單親家庭與兒童比例上揚的趨勢，更呈現出臺灣單親家庭居住型態的多元化以及少子化的趨勢（薛承泰，二〇〇二）。再者，根據內政部戶政司民九〇年的全國普查資料中，也有三一八、五四四戶（占全國六・七三八、五二九家庭戶之四・七三%）的單親家庭，其類別包括：未婚領養、未婚收養、未婚生子、離婚及喪偶。另外，在薛承泰（二〇〇一）的分析報告中有一點較值得注意

表二 臺灣的單親家庭研究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Total
碩士論文	篇數	4	3	6	3	3	5	3	4	8	12	11	62
研究對象	女單親	1	1	1 低	2	1	1 低	0	1	0	4*	1 低	13
	男單親									1	1		2
	家長		1	1			1		1	2	1	4	11
	子女	2		3	1	1	3	3	1	3	4	6	27
	親子	1	1	1		1			1	2	2*		9
取樣範圍	北部	2	1	5		2	2	2	2	3	3	1	22
	中部			1	1				2		1	4	9
	南部						1	1		2	1		5
	東部暨離島										2		2
	全省		1								1		2
	不詳	1	1		1	1	2			2	4(1#)	6(1#)	18
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	3	1	5	1	1	3	3	3	3	5	3	31
	質化訪談		1	1		2	2			3	6	7	22
	多元方法									1		1	1
	實驗設計				1				1	1			3
	文獻檢閱	1			1								2
	資料分析		1								1		2
註：4*=1 離婚+1 喪偶+1 低收+1 女單； #指透過網路取樣 資料整理自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1990-2000													

述以外，單親家庭的相關研究也能看出當代社會對此議題關注的程度與面向。由於單親問題幅員廣泛，因此研究單位遍佈各個層面，基於學術考量，筆者之檢索策略主要乃以「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與「國科會科資中心研究計畫摘要」二大資料庫為來源，搜尋一九九〇—二〇〇〇年間單親相關研究，共查得碩士論文摘要六十二篇，官方研究報告十六筆，一共有七十八篇與單親議題相關之研究。首先就「研究對象」、「取樣範圍」與「研究方法」對上述研究論文做內容分析。在全國博碩士論文部分，分析結果發現（表二）



圖一 我國單親家庭類型比例，一九九八
資料來源：整理自薛承泰，二〇〇一

除了人口學的描
值得關注。
生不同的適應問題，
統價值約束下另會衍
單親家庭，在我國傳
乃屬於名存實亡之準
婚。由於其居住型態
單親成因中僅次於離
（圖一），甚至在男性
未婚單親高出許多
例中高達一七%，比
年的單親家庭類型比
顯出來，在一九九八
的是，分居單親被突

表三 單親家庭福利需求

未成年之單親家庭及其子女	低收入單親家庭	一般單親家庭	經濟扶助	居住安排	教養服務	諮商輔導	就業服務	醫療衛生	司法服務
			托育津貼		托育照顧 課後輔導 家務服務	親職教育 成長團體 心理輔導 學校輔導	就業輔導 親職假期	全民健保	犯罪防治 法律服務 法律保障
			生活扶助 生活津貼 教育補助 訴訟補助 醫療補助 低利貸款 房租津貼	國宅申請 住宅租借			職業訓練 協助創業		
				住宿服務	兒童收養 兒童寄養 機構安置	復學輔導 生涯輔導 性教育			

論文數量在近兩年有大幅成長之趨勢，研究對象則主要聚焦在單親子女與女性單親戶身上，尤其是低收入女單親因為經濟弱勢更容易成為關注的焦點，然相形之下，特別針對男性單親之研究卻有如鳳毛麟爪，以未婚、領養與分居單親為對象之論文更是付之闕如。至於抽樣策略以立意為多，取樣範圍大都侷限在北部地區，東部暨離島僅有兩篇，其中研究範圍囊括全省的兩篇論文並非使用一手調

查資料，而是利用官方報告（如收支調查）做分析與推估；另外，近年調查研究出現一個有趣的潮流——「抽樣e化」，為身分敏感的單親研究抽樣帶來一個另類的思考。在研究方法部分，除了有少部分方案實驗設計、文獻檢閱與資料分析外，主要仍以量化研究與質性訪談為主。研究對象來源部分，因受限於樣本來源取得不易，研究對象大都來自於學校或福利機構的立意取樣，因此容易造成量化研究過於侷限的窘境，使得資料品質大受影響。有鑑於此，為能實際掌握單親現象之脈動，針對單親者的全面性調查實有其必要。

由於單親家庭的成因不同，同質性亦不高，因此呈現的問題內涵也就各有不同，以女性單親為例，其最常被探討的主題不外乎貧窮問題，男性單親則為親職壓力，單親子女問題則以偏差行為居多。筆者進一步分析上述國科會專題研究與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之單親家庭相關研究變項內容，發現單親家長的研究面向大致可類分為「經濟安全」、「子女照顧」、「心理情緒」與「社會適應」四大方面，單親子女的研究面向則以「心理情緒」、「自我概念」、「社會適應」及「行為偏差」四類問題為主。這種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雖然有藥到病除之效，卻缺乏正面的積極意義，也難一窺單親家庭之全貌。

單親家庭由於結構上的限制，所以在面對上述問題時，要比核心家庭更易缺乏資源來因應困境，因而導致問題的產生（張清富，一九九五），也因此過去單親家庭常常被冠上「破碎家庭」或「偏差家庭」等標籤而飽受歧視。但經過實務界十餘年的研究，對單親

家庭問題作更深入的瞭解後，已使得單親家庭逐漸擺脫問題家庭的刻板印象（薛承泰、劉美惠，一九九八）。彭淑華、張英陣（一九九五）曾就單親家庭的優勢觀點，從積極面去瞭解單親家庭，並協助其利用優勢度過危機、解決問題及自我成長。因此，當我們在探討單親家庭的問題時，必須客觀地從各個角度來看待，避免標籤化的成見，始能建構一個滿足單親家庭需求的福利服務政策與社會支援網絡。

所有的婚姻都會終結，其方式包括有死亡、婚姻無效、分居、離婚、及遺棄，而離婚已成為今日臺灣最主要的婚姻終結方式，加上疾病、意外死亡及未婚生子的比例增加，均促使單親家庭在臺灣社會中日益增多。當家庭瓦解，對於單親家長本身及其子女均有不利的影响，由於家庭功能的轉變，單親家庭正面臨經濟安全、子女教養、身心健康、社會關係、工作、居住問題及法律諮詢等福利需求，其需求也會因其弱勢條件的增加（如貧窮、未成年）而有不同需求及輕重緩急的優先順序，本文依相對弱勢條件區分出「一般單親家庭」、「低收入單親家庭」與「未成年單親家庭及其子女」三個等級之單親家庭的福利需求如表三。

貳、社會變遷之家庭困境

一、社會變遷與家庭

誠如二、五〇〇年前的希臘哲人 Heraclitus 所言：「世上沒有永恆之事，除了改變」。世界各國在社會變遷中，受到人口結構的改變，家庭組成型態的變化，男女性別角色的改變以及社會病態的行為的增加，也促使家庭成為社會變遷下的重要議題。例如美國為順應聯合國在一九九四年明定該年為國際家庭年，並將家庭成為公共政治議題；此外家庭學者與參眾議員也促使政府要訂定政策因應社會變遷下之家庭危機。美國與臺灣社會在社會巨輪牽引下，也帶動其結構因素的改變，而這些因素之變化也衝擊了賴以生存之家庭，茲分述如下：

人口結構的改變

世界各國面臨人口消長之壓力也衝擊社會及政府之實體，並改變福利服務之種類來滿足特定族群之需求。這些改變皆會影響個體所居住之家庭，例如：

老人人口之激增：在美國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增加的比率快速是其他一般人口增加的二倍，目前已超過一二%；而臺灣在一九九三年底，老年人口突破百分之七，已正式邁入「人口高齡化」社會。至二〇〇〇年九月底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達一九〇萬人，占總人口比例八·六%（行政院主計處，二〇〇一）。據估計，到二〇一〇年臺灣老年人口之扶養比為一六·八九%，到二〇二〇年為二三·八二%，至二〇五〇年將達五四·四二%。換言之，到二〇五〇年，臺灣不到

兩個工作人口數就要扶養一個老人（王德睦，二〇〇一）。

生育率的降低：美國婦女在一九七〇年代生育子女數比率是一·八，相對地，臺灣在一九六〇年代總生育率為六人，但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則降為一·七人，至二〇〇〇年實際生育人數為一·五，而且比率又有逐年降低之趨勢（王德睦，二〇〇一）。

女性勞動就業比率的提增：美國在一九九〇年代約有六〇%之女性勞工進入就業市場，臺灣相對地比率約在五四·一%上下，已婚女性目前有工作之比率為四九·七%（內政部統計處，二〇〇一），特別是家中有年輕子女之女性，上班工作比例也相當高，此外，單親家庭族群其為子女家計生存，也必須進入就業市場。

離婚率的上升：美國在一九七〇年代離婚率上升至五一%（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80），時至今日也維持在四〇%左右，而且也有穩定性的成長，此種現象也造成單親家庭比例增加；而臺灣目前約有四·七三%的家庭戶口是單親家庭，其中離婚佔有五二·三%（內政部戶政司，二〇〇一）。臺灣在一九九〇年來說，有一七三、二〇九對登記結婚（粗結婚率為千分之七·八七），有九、〇〇三對登記離婚（粗離婚率為千分之二·二三），約為三·五：一。兩千年時結婚對數為一八一、六四二，離婚對數為五二、六七〇，當年離婚人口約佔一五歲以上人口之四·二%，男女有偶離婚率達千分之一〇·七，相對於一九九〇年的千分之六·三，十年間有偶離婚率增加七成，已是亞洲之冠。這也意味著家中十八歲以下之子女在成年之前，至少有相當比例會在單親家庭中度過。

遲婚現象：婚齡女性進入勞動市場比率上升，適合婚姻市場之男性比例下降，甚至更有人選擇不結婚，諸此原因皆可能造成現代人遲婚，也造成人婚後生子比例下降，或家庭形成老父（母）少子（女）之現象。

理想與價值的改變

女性運動

由於平權觀念，再加上通貨膨脹的壓力，婦女走出家庭投入勞動市場不再受到社會輿論的壓抑，婦女工作機會的增加，造成家庭既有之男女角色分工面臨重新調整的挑戰，養女育女不再是女性一個人的責任，為了使婦女能無後顧之憂地安心投身就業市場，政府部門相關福利措施與配合服務措施務必隨之配合，例如二〇〇二年三月八日正式上路之兩性工作平等法，即破除男性獨大之歧視迷思，多取女性之工作平等，及有關家庭照顧假，女性生理假、育嬰彈性工時，企業提供托兒服務及相關性騷擾之防治措施，以落實男女兩性平等及平權。

生活型態

隨著社會的變遷，國民經濟所得的提昇，使得人民生活水準也相對地提昇。因此，在臺灣過去五〇餘年的發展經驗中，除了配合經濟政策的修正與轉向，主要是憑藉著廉價、勤奮與優異的勞動力，還不但成功地將臺灣社會由農業國家轉型為工業國家，同時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而成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典範（劉小蘭，一九九九；張瑞晃，一九九七）。而這些社會經濟的改變無形上也牽引了宗教傳

統，道德及家庭制度的改變，甚至影響個人之價值及生活型態的改變。然而，家庭的形成變成多元的、有傳統的家庭、有單親家庭、有雙生家庭、有收養家庭等；甚至於家庭的組成是可變的，其組成更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些變化皆挑戰新的家庭價值及新的家庭角色。

兩性角色

從美國過去的傳播媒體，從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之Beverly Cleaver的連續劇，媽媽在家烤餅乾，阿姨在家照顧小孩，至一九八〇年代之Three's Company演出一男兩女同居在一住處，共同過著顯著家庭的生活；Cramer VS. Cramer敘述夫妻離婚爭取兒子的監護權，而Bill Cosby Show的雙生家庭。這些戲劇描繪著兩性角色的變化，這也意味這社會男女性別角色再被重新定義。對女性而言，除了平常持家與養育孩子之眾多責任外，還要加增新的角色，如工作，有時也帶給女性陷入「女強人」症候群和精疲力竭(burnout)之兩難及壓力困境中。而男性，它們也同樣地面臨不穩定的新局面，不僅被要求在工作職場上與女性分享地位與權力，在家裡對他們也有比對他們父親那時更多的期待。今日的父親被要求與孩子一起玩，要與母親輪流帶孩子看醫生，煮晚餐、管理家務等。

社會病態因素增加

改變是令人迷惑的，因為變動發生在社會上的各個重要的組織(Gestwicki, 1992)。父母親在最近幾十年來比之前社會遭遇過更多的困難及快速的變遷，而這個社會也帶給父母及其家庭許多壓力。社會的變遷導致價值觀、法律和行為準則之改變，以致形成不同的

生活方式。公民權力運動、婦女運動、藥物濫用、性行為開放等，使社會產生一些不健康或病態因數，分述如下：

家庭暴力

家庭應具有提供親密性及保護的功能，但是現今社會家庭卻是會傷人的。家庭中夫虐妻、妻虐夫、父母虐待子女或是子女虐待父母時有所聞，嚴重造成世人的受傷、甚至死亡，所以家庭暴力又可稱為親密的謀殺(intimacy murder)。臺灣在一九九二—一九九六年期間針對婚姻暴力做相關研究發現：早期在一九九二年，臺大馮燕副教授調查全國一三一〇位已婚婦女，其中發現高達三五%婦女，答稱自己有被丈夫虐待的經驗；一九九四年臺灣省政府社會處，陳若璋教授也對國內已婚婦女從事「臺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其中發現，有一七·八%婦女承認自己曾被丈夫虐待的經驗；一九九五年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也做了一項「一九九五臺灣婦女動向調查」，亦有一七·八%婦女曾遭丈夫毆打；同年，現代婦女基金會也針對全省的婦女，做了一項大規模的調查，在回收的七千份有效問卷中，有一一·七%婦女填答自己曾在家中有被毆打的經驗；一九九六年，TVBS電視新聞臺也做了一次電話訪查，受訪者中有三成承認，他們的女性親友曾被先生施暴(潘維剛，二〇〇一：四八)。我國政府為因應有關家庭暴力事件頻傳，特將兒童福利法、家庭暴力法、及性侵害防治條例之立法，以遏阻家庭傷害的產生，並保障弱勢族群(兒童與婦女)之權益保障。

未婚懷孕

二〇〇二年臺閩地區單親家庭調查發現未婚生子人口四五、九

三八人，占臺閩地區總戶數〇・七%（內政部統計處，二〇〇二）。張明正（一九九九）指出，一九九五年青少年未婚懷孕非婚生育個案有九〇〇〇餘案，十五—十九歲未成年生育率為千分之十七，超出日本四倍，為全亞洲之冠。而美國青少年未婚懷孕比例為一〇%，更為世界之冠。當青少年未婚懷孕其面臨家人關係改變與同儕異樣眼光、甚至因懷孕而提早結束學業，謀求一技之長，影響其經濟能力及未來自主及自我照顧能力。

中輟學生

中途輟學比率居高不下，甚至有與日俱增的現象。八十年代，美洲地區的輟學率仍高居達二一%，亞洲地區則有九%。在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學年度經濟高度發展的美國，有兩百萬名學生有輟學經驗情形產生（Dupper, 1994）。根據我國教育部在一九九九年的統計，從八四學年度至八六學年度，平均每學年已有九、〇〇〇名至一〇、〇〇〇名的學生輟學。教育單位與父母應著重降低學生的輟學率，或協助其提早進入就業市場，以避免因謀職能力不足而流落低社經地位或走上歧途（郭靜晃，二〇〇一a）。

犯罪率上升

根據法務部（一九九六）的資料顯示：臺灣地區少年犯罪人口占少年人口的比率由一九八六年每萬人中二一・一四人增加至一九九五年的三五・七五人，增加六成之多。而在質方面，近年來少年犯罪性質更有惡質化、低齡化、集體化、預謀化的趨勢，由此可見少年犯罪的嚴重性。

二、社會變遷對單親家庭之影響

單親家庭的困境

家庭除了受到家庭內成員與成員間互動的微視面影響之外，也無可避免地受到整個鉅視面社會生態系統的波動而帶來一些衝擊與壓力。單親家庭的數目與比例也逐漸增加，而使社會大眾重視單親家庭的存在。此外，大眾傳播媒體也常將少年之社會病態行為歸因於單親家庭，所以無形上社會大眾也將單親家庭標記為「偏差」、「不穩定」、「破碎」、「問題」的家庭。持這些論點之學者大都認為單親家庭的子女在人格發展、社會行為與學業成就等表現較差。就親子社會化的觀點，父母之行為特徵常會模塑其子女之行為（McCoby & Martin, 1983; Peterson & Rollins, 1987; Kuo, 1992）。這個觀點也最常由心理分析及社會學習理論所倡導：單親家庭的子女其自我概念較低，對人缺乏信任感，性別角色未分化，內外控發展較差，有較高之焦慮、憂鬱、沮喪及恐懼情緒反應（張美麗，一九九二）。社會學者如Parsons則採取角色理論的觀點，認為單親家長在工作謀生以求生活無虞的同時，常會衍生子女照顧的問題，在乏人分憂解勞無奈下，角色衝突與角色負擔過重的事情便會油然而生（劉淑娜，一九八四；鄭麗珍，一九八八；林萬億、吳季芳，一九九三）。之後Hilly在一九五八年提出ABCX之家庭壓力理論，主張家庭在面對壓力情境之初，壓力事件（因素A）與其家庭藉以調適壓力之內、外在資源（因素B），以及家庭對此壓力之認知（因素C），三

種因素互動後才會產生壓力覺知或危機（因素X）。一個家庭是否產生危機，並非它沒有困境，但此家庭的特質是否遭逢困境能坦然面對，並運用有效資源因應，而成為有效的壓力管理的家庭（藍采風，一九九六）。至於單親是否對子女或父母形成影響，其影響是正向或負向以及如何影響也眾說紛紜，各有其研究支持，茲分述如下：

對子女之影響

Herzog and Sudia (1971, 1973) 辯稱並不是所有父或母缺位的單親家庭皆會造成對孩子的影響，而是家庭的氣氛與互動模式（family interactional pattern and environment）及家庭過程（family process）才是影響之關鍵因素。此種命題稍後也在Kagel, White and Coyne (1978), Raschke and Raschke (1979), Berg and Kelly (1979), Marotz-Baden et al. (1979) 的研究獲得支援。Kagel, White and Coyne (1978) 的研究區分青少年日後行為偏差之因素是他們知覺其家庭環境是否為溫暖的，有回應性及具凝聚力等家庭互動因素有關，而與家庭結構無關。Raschke and Raschke (1979) 指出公立小學學童認為其家庭氣氛不愉快且具衝突，他們的自我概念較低，而與家庭結構因素無關。Berg and Kelly (1979) 指出當學齡兒童被父母拒絕，其自我概念低，而與家庭結構無關。Marotz-Baden et al. (1979) 認為家庭是否正常不在於家庭結構（family norm）是單親或雙親，重點是在家庭過程。家庭過程對子女的發展可以是負面的也可以是正面的影響，所以，真正影響子女發展的因素是：家庭內的氣氛（情緒）狀況、家庭成員間的關係是

和諧或衝突、家庭經濟的穩定性、教導子女的方式與品質與角色典範（郭靜晃，二〇〇一）。

社會家 Steieman 在一九五七年指出：婚姻失敗者之小孩，常遭受同伴嘲笑，心懷自卑，嚴重的心理後果會造成行為上之失常病態，故少年犯罪者有許多出身於破碎家庭（陳怡冰，一九九一：三二）。Demo and Acocck (1988) 提出單親兒童的心理健康較雙親兒童為低，且雙親之一的缺位若是因分居、離婚或遺棄所形成，則特別對於青少年有更為不利的影響。雙親的缺位使得兒童不易學習到適當的性別角色行為，使得兒童的發展，特別是青少年的發展缺乏角色楷模，而對其認知發展、成就動機、道德學習及順從等行為產生影響。其次，青少年正處於 Erikson「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當父母其中一位角色缺位或角色負荷過重，是否造成個體本身的發展障礙？單親家庭的形成，對青少年子女有什麼影響？王美芬（一九九三）指出單親家庭與雙親健全的正常家庭比較起來，單親家庭意味著家庭破碎的結果，形成的原因就夾雜了哀傷、怨懟：等不愉快情緒，諸如以親職功能的立場來看，在整天辛苦工作之餘，又需料理家務，實難有餘力再去處理子女的心理及情緒問題，以及與子女做更深的互動。

就家庭發展階段來說，當子女處於青少年階段時，正好是父母進入所謂中年危機的時期，許多父母重視自我實現的需求甚於放棄子女自我發展的機會，而這個階段正好是他們個人生涯突破或轉折的關鍵期。在這階段，青少年追求自主（autonomy）是一種普遍心理，在家中他們渴求「行為自主」與「情緒獨立」，甚至「價值自主」

與「道德自主」，他們極期望獨立與自治，不過青少年是否能成為一位獨立、自主、自信與開放的人，卻與其親子關係及父母教養方式密切關聯（胡正文，一九九九：一二六）。換言之，單親家庭需要更多拉力來幫助青少年處理問題，使青少年獲得更健全的生活環境，否則會引起認同或疏離危機，造成個體不適應行為發生。

筆者利用國內博碩士論文檢索系統，檢閱國內有關單親家庭對青少年影響之文獻整理：國內有關單親青少年之量化研究大部分是以問卷調查法為主，進行相關研究探討，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研究單親青少年都以單一或多元變項進行相關，卻無法瞭解整體性的單親青少年情形，其內容大致是子女教養問題（黃斐莉，一九九三；謝美娥，一九九六；何永俞，一九九三；鄭玉喬，一九九〇）等人；親子關係（蔡松珍，一九八九；謝品蘭，一九九三；吳永裕，一九九六；吳虹妮，一九九八；李育忠，一九九九）等人；單親青少年自尊低落（何永俞，一九九三；鄭秋紅，一九九三）等人、學業低成就（繆敏志，一九九〇；余啟名，一九九四；陳圭如，一九九五；何美瑤，二〇〇一）等人；單親家庭兒童人際關係與人際技巧顯著低於正常家庭的兒童（周孟香，一九八八；劉永元，一九八八；蕭舒云，一九九七）等人；生活適應上的困難（李慧強，一九八九；繆敏志，一九九〇；陳怡冰，一九九二；管貴貞，一九九二；吳靜樺，一九九四；鄭麗珍，二〇〇〇）等人；偏差行為（周孟香，一九八八；呂民璿和莊耀嘉，一九九一；黃富源，一九九七；侯南隆，二〇〇〇；陳羿足，二〇〇〇；何美瑤，二〇〇一）等人；心理健

康與幸福感（郭怡伶，一九九五；郭至豪，一九九六）等人；情緒穩定（張貝萍，二〇〇〇）；休閒情形（王美芬，一九九三）等等；而質化研究則以訪談方式居多，研究內容主要對於其生活經驗與意義、單親形成的事實加以著墨。

相關研究（例如，呂民璿和莊耀嘉，一九九一；陳怡冰，一九九二；何永俞，一九九三；鄭秋紅，一九九三；王沂釗，一九九五；薛承泰，一九九六b；鄭麗珍，一九九八）等皆指出：由於家庭因遭遇變故而形成的單親家庭，對於子女在發展與適應上易產生不利的影響，如：親子互動差、生活適應不良、人際關係支援不良、行為困擾、情緒不穩定、低自我概念、低學業成就、與性別角色認同模糊等方面，單親家庭的子女比正常家庭的子女有更高程度的負向發展情形。然而，這些研究可發現單親家庭結構變項本身並非導致青少年生活不適應的直接因素，而是潛存於家庭結構型態中不利因素，如親子互動、社經地位、同儕互動、社會支援所造成的種種因素影響了單親家庭生活。

最近的全國性單親生活狀況調查研究內政部統計處，二〇〇二亦指出：單親家庭家長對其子女管教方面感到有嚴重之問題，其比例高之項目依次為「子女行為有偏差」（占一九・一%）、「不知如何管教」（一五・八%）及「無時間管教」（一二・八%）。此外單親家庭家長對其親子關係有近三成左右之家長表示感受關係很差。至於單親家庭對其子女的學業方面的表現，父母感到嚴重的問題，比例高之項目依次為「無法輔導子女作功課」占（二三・三%）、「子女學業成

績太差」(占一九·五%)、「子女不喜歡讀書」(占一六·九%)。而認為「父母無時間管教」及「子女行為有偏差」之父母者近二成八。

至於，單親經驗對子女「稍有影響」之程度，單親父母認為是「心理健康」(五二·七%)、「學業或成就」(四四·六%)、「人際關係」(四四·四%)、「行為常規」(四六·〇%)、「性格養成」(四七·五%)、「人生態度」(四六·〇%)、「婚姻看法」(四六·〇%)等問題。單親經驗使單親子女自我概念形成造成影響，對其自我價值看法產生偏差或低落。然而，單親家庭並非全然負面影響，吳靜樺(一九九四)的研究即指出：父母離婚對青少年本身亦有正面影響，例如在性格方面趨於獨立、成熟；而在家庭氣氛方面，離婚結束了家庭成員長期的衝突或家庭成員重新建立新關係，家庭氣氛因而轉好。「單親家庭」名詞不至於對子女產生烙印與偏見看法，所以，媒體應給予單親家庭正面報導，去除「單親家庭等於偏差家庭」、「單親家庭對於弱勢家庭」等標籤，而減緩單親家庭飽受社會大眾歧視的眼光。

對父母之影響

單親家庭由於結構上的限制，所以在面對社會壓力、工作及子女教養時，要比核心家庭更易缺乏資源來因應困境，因而導致問題的產生(張清富，一九九五)，也因此在過去單親家庭常常被冠上「破碎家庭」或「偏差家庭」等標籤而飽受歧視。但經過實務界一〇餘年的研究，對單親家庭問題作更深入的瞭解後，已使得單親家庭逐漸擺脫問題家庭的刻板印象(薛承泰、劉美惠，一九九八)。彭淑華、張英陣(一九九五)曾就單親家庭的優勢觀點，單親家庭的成因不同，同

質性亦不高，因此呈現的問題內涵也就各有不同；不論形成原因為何，「單親」對每個家庭而言，都需經歷一連串的創傷經驗與一種不得已的抉擇。而家庭也會因單親事件產生一連串心理上、社會上和經濟上的改變，進而影響單親家庭成員生活經驗的改變，如經濟狀況的改變、身心適應問題、角色負荷加重、子女教養問題、活動參與問題、福利服務問題等。整體而言，其較常引起注意的不外乎心理社會、生理健康以及經濟安全等面向的問題，以下便就此三個層面，參照國內外發展現況，從優勢與弱勢觀點來闡述我國單親家庭的境遇：

心理社會層面

由於人類天性渴望愛與被愛，可是夫妻離異、親人死亡等遽變使得單親家庭成員失去了情感的聯繫，導致孤立失落，因而造成了許多弊病叢生，如緊張、焦慮與挫折，當這種緊張關係在家庭中緊繃至一臨界點而致使家庭失能時，便有可能產生偏差行為或不幸事件。單親家長在經歷家庭遽變之後，由於生活週期斷裂，教養子女負荷繁重，使得他們在分離失落及角色衝突的雙重煎熬中承受著相當大的精神壓力，Weiss(1982)便指出單親者容易會有沮喪、焦慮、寂寞與不幸福等感受，甚至產生如酗酒等偏差行為(林萬億、吳季芳，一九九三)。若是其原有的人際關係與社會地位又因單親事件而有所變動，則將更會影響到單親家長的社會適應。由於我國社會文化仍傾向保守，因此在傳統價值觀的框限下，單親家長對自我覺知的歸因更易偏向於負面，因而對未來生涯的規劃躊躇不前，造成本身內在的壓力與衝突。張佩韻(一九九八)便指出社會對單親的負

面印象等讓單親父親倍感壓力；劉雅惠（二〇〇一）更進一步指出衝突與生活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尤以女性為著。

由於道德的偏見使得部分民眾對單親家庭投以異樣的眼光，造成社會烙印（social stigma）現象（Kerka, 1988），如果單親家庭無法承受這股壓力，而自原有社會人際網絡中逐漸撤離，便會形成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甚至發生社會連結（social bonds）不穩定的情形，無法與他人建立持久的關係（引自朱貽莊，一九九七），此時單親家庭不是自我孤立，便是遷居或轉換職業，這種現象在離婚和非婚姻型態的單親家庭又更為明顯（張英陣、彭淑華，一九九八）。

單親處境並非全然的弱勢，單親家庭在心理社會適應上亦有其優勢的一面：相對地於情感疏離、名存實亡的空洞家庭，有研究指出，單親家長在跳脫遽變的漩渦之後，反而能自我解脫而有所成長，加上對子女的管教態度因單元化而無不一致之情形，因此親子關係也比以往更親密（彭淑華、張英陣，一九九五）；另外，基於「血濃於水」之傳統家庭價值觀的驅使，因此我國單親家庭要比國外獲得更多來自於原生家庭的支援與資源。如親情連結、互惠協助、可近性、彈性與低成本等優點，均可以成為單親家庭的優勢助力（吳婉慧，一九九九）。

生理健康層面

由於單親家長既要身兼父母職又要養家活口，因此承受著很大的照顧負荷與工作壓力，而這些壓力往往在生理症狀中找到出口，以身心症來宣洩。最常見的症狀便是身體功能退化、難以入眠和健

康狀況不佳（洪秀珍，二〇〇〇）。生理健康對生活品質的影響，受到多重因素的左右，不過箭頭均指向負向關聯。王慧琦（一九九二）在針對離婚者生活適應的研究中便指出：支援系統與壓力認知會影響其健康情形，一般而言，壓力覺知越小，社會支援系統越多元，其自覺健康狀況越好。俗話也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因此，生理健康對一個人的生活品質有決定性的影響。

經濟安全層面

國內外的研究均指出，在眾多單親問題當中，經濟安全是單親家庭最大的隱憂。物質條件不僅會對子女照護問題產生不良影響——子女所能獲得的物質資源減少，甚至直接牽動著家庭的生活品質。在所有單親類型當中，以女性單親最容易落入貧窮困境，形成「貧窮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現象：Garfinkel and McLanahan（1986）與 Kerka（1988）便指出女性單親戶是全美最貧窮的家庭；張清富等（一九九五）的研究也顯示我國約有一半以上的單親家庭收入低於三萬元，其中女性單親更因長期操持家務、無一技之長或需兼顧子女照顧而無法穩定工作，導致重返勞動市場上的弱勢，甚至因為男性較高的再婚比率而降低了贍養費的給付能力，因而比男性單親更易遭受經濟匱乏的威脅。尤有甚者，當經濟資源短缺而間接影響單親子女低學業成就，乃至低職業成就時，勢必形成福利依賴的惡性循環，導致「貧窮代間移轉」的結果（林萬億，一九九五）。另外，Kerka（1988）也特別指出：由於美國有一／一〇的青少年成為單親媽媽，因而更潛伏著「貧窮青少年化」（juvenilization of poverty）的危機。以上

種種現象均警示單親家庭的經濟困境且與單親戶的普遍化有關 (Bianchi, 1999; Popenoe, 1993)。

不過，也有研究指出單親家庭亦有其經濟優勢面，例如掌握經濟自主權，不用受制於人（彭淑華、張英陣，一九九五）。尤其是女性，其原本在家庭中的經濟弱勢地位也將易地而處。

最近的全國性單親生活狀況調查研究（內政部統計處，二〇〇二）亦指出：近半數單親家庭最近一年每個月平均收入在兩萬四千元之下，其中又有一半收入不及平均最低薪資，且調查過程中有六成受訪單親表示入不敷出，此現象已突顯單親家庭的經濟困境。尤有甚者，有近四成的單親家長除自己子女外，尚需扶養父母，而經濟來源有八成以上需靠單親家長本人之所得，其次為父母提供，獲政府補助之比例不到一成，此結果顯示單親家庭的經濟性支援相當脆弱。

單親家庭家長對其子女管教方面感到嚴重的問題，比例最高為「子女行為有偏差」（一九・一％）、「不知如何管教」（一五・八％）及「無時間管教」（一二・八％）。此外，單親家庭成員，感受到「對不起子女或父母」、「經濟維持的壓力」、及「工作或經濟壓力」；其感情困擾嚴重度更依單親形成年數增多而遞減。

單親家庭托育與教育費用平均需「五、〇〇〇—九、〇〇〇」元為最高，且就讀托育及才藝班比例之提高，產生新的經濟支出項目（內政部統計處，二〇〇二）；針對子女照顧、管教、子女學業及工作、事業問題之困擾皆是單親父母所面臨的困境

參、結論與建議

在社會變遷巨輪下，臺灣也和歐美社會般，由於現代化過程中，女性教育與勞動力的提升，以及兩性平等觀念的興起，也造成傳統家庭與婚姻價值觀相當大的衝擊 (Goode, 1982; 徐良熙、林忠正，一九八四)，如人口結構的改變、理想與價值的改變和社會病態因子的增加。此外，單親家庭已是成長最快速的家庭類型，由於結構上的限制，所以在面對形成單親家庭時，要比核心家庭更易缺乏資源來因應困境，故容易導致問題的產生（張清富，一九九五），也因此，在過去單親家庭常常被冠上「破碎家庭」或「偏差家庭」等標籤而飽受歧視。至於單親是否對子女或父母形成影響，其影響是正向或負向以及如何影響也眾說紛紜，各有其研究支持。然而在二〇〇一年臺閩地區之全國近四千份單親家長所作的生活狀況調查資料顯示：我國單親家庭除了未婚媽媽及低收入戶外，所能獲得的福利支持有限；大都僅靠自我和非正式支持系統，例如親朋好友和社會團體，而且經濟所得有限但支出卻龐大，所以有經濟需求的壓力。此外，由於角色負荷過重及其限制，同時要身兼父母二職，尤其是單親母親，不僅要照顧子女，又有孩子托育與教育之經濟上的壓力。除此之外，單親父母在形成單親之後，對親人持有愧疚的感受而覺得情感困擾。然在面對子女管教方面，單親家長有近三成左右感受與子女關係很差，他們覺得其子女行為偏差、不知道如何管教和無

時間管教；至於單親之形成對子女之影響，單親家長則表示影響之方面有：「心理健康」、「學業或就業」、「人際關係」、「行為常規」、「性格養成」、「人生態度」、「婚姻看法」等。近年來，我國隨著經濟成長及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國民對社會福利的關注與需求急速增加，在社會的持續變遷下，單親家庭儼然已成為社會中的第二大比例的家庭型態。面對家庭形成單親的困境，政府對於單親的家庭福利也由以往消極的經濟安全補助，思索提供更為縝密的福利服務措施，如強化親職教育方案、社工積極與密集的家庭處遇、建立社會支持網絡和訂定單親家庭相關法令與政策，藉此幫助單親家庭危機處遇及維護單親家庭成員的生活需求並提昇其生活品質。

單親家庭現象會成為社會福利政策的關注，除了傳統因喪偶所形成的單親戶具有「其情可悲」的弱勢特性，離婚率的升高以及未婚生育增加所帶來的單親戶，特別反映出現代社會婚姻與家庭的脆弱，並極可能產生對下一代不利的影響。因此，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單親戶」，乃強調單親（通常因離婚、喪偶、收養、分居）和依賴子女所構成的生活單位。當然，不論喪偶或離婚，都未必形成「單親家庭」，主要還需考量是否有依賴子女共同生活（薛承泰，二〇〇二）。

單親家庭是一個異質性相當高的族群，不同的單親家庭有其不同的需求，但是較常面臨的經濟安全需求包括：穩定的所得來源、子女教育經費、醫療補助、住宅的安排、就業服務、福利服務、急難救助與低利貸款等，故要滿足單親家庭的需求必須同時兼顧所得維繫、就

業、兒童照顧；依照單親家庭之眾多實務研究發現，經濟需求仍是女性單親家庭最為迫切的問題，以下就經濟需求面提出建議：

一、增加婦女就業機會，使其有較好的收入以及待遇。

二、特殊境遇婦女之自助系統。

三、因現今津貼維持僅是以基本維生的程度，不足以改變持續性之困境，所以應擴大其他福利服務，例如將家庭取向之福利擴展到低收入戶單親家庭，可採取政府提供雇主一個福利免稅激勵方案給低收入戶單親工作者，這可包括雇主將福利提供地方性兒童照顧提供者、居家服務或成人日托中心等福利服務。

四、由政府提供就業輔導、職業訓練、家務員服務及增設合格、平價的公私立托育服務、兒童補助津貼等。

單親家庭的需求是相當多元的，不應只是關注於經濟安全的需求，我們也應該重視其心理、靈性與社會層面的需求，所以應加強單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一、不給予標籤化以造成二度傷害。

二、辦理單親家庭親職教育活動，以豐富單親家庭之子女成長經驗，並增進家長對子女之教養效能與親子關係之和諧。

三、辦理成長團體以及聯誼團體，強化單親家庭之社會支持網絡。

（本文作者均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 參考文獻：

- 內政部戶政司（二〇〇一）。臺灣地區人口調查。內政部戶政司。
內政部統計處（二〇〇二）。臺閩地區單親家庭生活狀況調查。內政部統計處。
- 王沂釗（一九九五）。家庭結構、親子關係與青少年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學生輔導通訊，三六，一〇八—一一八。
- 王美芬（一九九三）。單親青少年休閒狀況之調查研究。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德睦（二〇〇一）。人口。王振寰與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增訂版），臺北：巨流書局，五三七—五六二。
- 王慧琦（一九九二）。離婚者生活適應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朱貽莊（一九九七）。單親家庭兒童福利需求之探究，社會建設（九八），九一—一〇六。
- 何永俞（一九九三）。不同家庭結構中父母管教方式對子女自尊心與偏差行為之影響研究。文化大學家政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美瑤（二〇〇一）。國中生家庭結構、學業成就與偏差行為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余啟名（一九九四）。國小單親兒童其學業成就、自我觀念與生活適應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臺中師院初等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永裕（一九九六）。單親兒童之親子關係、行為困擾與學習適應研究。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虹妮（一九九八）。單、雙親家庭青少年知覺之父母衝突、親子關係與其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靜樺（一九九四）。離婚家庭青少年其子女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呂明璿、莊耀嘉（一九九一）。單親家庭與青少年違規犯罪行為。東海學報，三三，二四七—二八四。

法務部（一九九六）。中華民國八十四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臺北：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

李育忠（一九九九）。父母婚姻關係、親子互動對高中職子女異性交往之相關研究——臺東地區單、雙親家庭之比較。臺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慧強（一九八九）。臺北市完整家庭與破碎家庭子女失調行為之比較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婉慧（一九九九）。「三代情——以父母支持離婚女兒為例探究代間協助」，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孟香（一九八八）。離婚家庭關係與學齡子女行為困擾相關之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萬億（一九九五）。從社會政策觀點談單親家庭。單親家庭——福利需求與因應對策論文集。

林萬億、吳季芳（一九九三）。男女單親家長生活適應之比較分析。

中國社會學刊（一七），一二七—一六二

侯南隆（二〇〇〇）。我不是壞小孩—喪親少年的生命故事與偏差行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秀珍（二〇〇〇）。高雄縣單親婦女社會支持、社會參與與生活適應之關係。高雄師範學院成人教育研究所。

胡正文（一九九九）。青少年階段中的親子衝突、溝通與親密關係之探討。載於家庭教養與休閒文化。實踐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印，一二一—一六四。

徐良熙與林忠正（一九八四）。「家庭結構與社會變遷：中美『單親家庭』之比較」。中國社會學刊，八：一一—二二。

張貝萍（二〇〇〇）。單親家庭青少年自我分化、情緒穩定與偏差行為之相關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

張佩韻（一九九八）。離婚單親父親父職角色與親子關係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英陣、彭淑華（一九九八）。單親家庭的社會問題與社會政策探討。社區發展季刊，（八），一二—三〇頁。

張清富（一九九五）。單親家庭現況及其因應對策之探討。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

張清富（一九九二）。貧窮變遷與家庭結構。婦女與兩性學刊，三：四—一五八。

張瑞晃（一九九七）。臺灣地區產業結構變遷與生產力解析。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論文。

郭至豪（一九九六）。臺北市單親家庭青少年生活壓力、福利服務介入與其心理健康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怡伶（一九九五）。青少年母子互動與婦女及其子女心理社會幸福—單親與雙親家庭之比較研究。

郭靜晃（二〇〇一）。中途輟學青少年之現況分析及輔導。臺北：洪葉文化。

陳圭如（一九九五）。單親家庭子女的自我概念、角色行為與教育期望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怡冰（一九九二）。親子關係與兒童社會技巧之相關—單雙親家庭之比較研究。學生輔導通訊，二三，四五—五三。

陳羿足（二〇〇〇）。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家庭因素研究—以臺中地區為例。私立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淑華、張英陣（一九九五）。單親家庭的正面功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黃富源（一九九七）。親子關係、人格適應與內外控取向對少年犯罪傾向影響之研究。警政學報，一二，一二六—一四三。

黃斐莉（一九九三）。臺北市單親家庭子女照顧之研究。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管貴貞（一九九二）。臺灣省女性單親家庭經濟困境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小蘭（一九九九）。臺灣產業結構變遷之研究—以要素賦現象分

析。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永元（一九八八）。單親兒童與正常家庭兒童人際關係、行為困擾及自我觀念之比較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碩士論文。

劉淑娜（一九八四）。寡婦家庭的支持系統與生活適應。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雅惠（二〇〇一）。中小學教師的工作——家庭衝突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政大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松珍（一九八九）。單親家庭親子關係、性別角色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玉喬（一九九〇）。家庭結構與學齡兒童學業成就之研究——單親家庭與雙親家庭之比較。文化大學家政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秋紅（一九九三）。單親家庭國中生親子互動關係、自我尊重、社會支援與寂寞感研究。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麗珍（一九八八）。低收入單親女性家長的角色負荷和社會支援網絡之相關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麗珍（二〇〇〇）。家庭結構與青少年前期學童的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以臺北市為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專案委託研究。

鄭清榮、譚悠文（一九九七）。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臺北：天下文化。

蕭舒云（一九九七）。臺北市單親家庭國中生同儕人際關係與性別角色態度之研究——與雙親家庭作比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繆敏志（一九九〇）。單親兒童學業成就、人格適應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薛承泰（一九九六a）。臺灣地區單親戶的數量、分佈與特性：以一九九〇年普查為例。臺大人口研究中心人口學刊，一七，一—三〇。

薛承泰（一九九六b）。再論單親家庭。社區發展季刊，五六，三〇六—三一。

薛承泰（二〇〇一）。臺灣單親戶及其貧窮之趨勢分析。臺灣單親家庭之現況與政策研討會。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一—一八。

薛承泰（二〇〇二）。臺灣地區單親戶的變遷：一九九〇年與二〇〇〇年普查的比較。臺大社工學刊，六，一—三四。

薛承泰、劉美惠（一九九八）。單親家庭研究在臺灣。社區發展季刊，八四，三一—三八。

謝品蘭（一九九三）。單親家庭親子關係與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以離婚分居家庭為例。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美娥（一九九六）。單親家庭的子女照顧與教養需求。單親家庭福利服務研討會。內政部、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藍采風（一九九六）。婚姻與家庭，臺北，幼獅文化事業。

Bianchi, S. M. (1999). Feminization and juvenilization of poverty: Trends, relative risk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307-333.

Berg, B. & Kelly, R. (1979). The measured self-esteem of children

- from broken, rejected and accepted families. *Journal of Divorce*, 2, 263-369.
- Bumpass, L. L. (1984) Children and marital disruption: A replication and update. *Demography*, 21, 71-82.
- Demo, D. H. & Acock, A.C. (1988). The impact of divorcee on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0, 619-648.
- Dupper, D.R. (1994). Reducing out-of-school suspension: A survey of attitudes and barriers. *Social Work in Education*. 16(2), 115-123.
- Garfinkel, I. & McLanahan, S. S. (1986). Single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A new American dilemma.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 Gestwicki, C. (1992). Home, school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2nd ed.). New York: Delmar Publishers Inc.
- Goode, W. J. (1982). The family (2n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 Herzog, R., & Sudia, C. (1971). Boys in fatherless families. Washington D.C.: U.S. DHEW Office of Child Development.
- Herzog, R., & Sudia, C. (1973). Children in fatherless families. In B. Caldwell & H. Ricciuti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3),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gel, S., White, r., & Coyne, J. (1978). Father-absent and father-present families of disturbed and nondisturbed adolesc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8, 342-352.
- Kameran, S. B. & Kahn, A. J. (1989) Single-parent and female-headed families in Western Europe: Social change and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1, 3-34.
- Karger, H. J. & Midgley, J. (1994).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social polic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Kerka, S. (1988), Single parents: Career-related issues and needs, Columbus: ERIC Clearinghouse.
- Kuo, J. H. (1992).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ral judgment development, quality of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nd well-being in families with adolescents: An interim report. 華僑研究雜誌, 9, 93-163.
- Maccoby, E. E., & Martin, J. A.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M. Hetheringto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4, 4th ed.). New York: Wiley.
- Marotz-Baden, R. et al. (1979). Family norm or process? Reconsidering the deficit family model approach. *The Family Coordinator*, 30, 5-14.
- McLanahan, S. S. & Sandefur (1994).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What hurts, what hel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on, G. W., & Rollins, B. C. (1987). Parent-child socialization. In M. B. Sussman & S. K. Steinmetz (Eds.).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Popenoe, D. (1988). Disturbing the nest: Family change and decline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Raschke, H., & Raschke, V. (1979). Family conflict and children's self concepts: A comparison of intact and single-parent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1, 367-374.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1980). Social indicators II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Weiss, R. S. (1982) . Attachment in adult life. In C. M. Parkes & J. Stevenson-Hinde(Eds.), The place of attachment in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Basic Books.
- Weitzel, J. R. (1990). American families: 75 years of change. Monthly Labor Review (March):4-13.